

往事如昨

## 徐镜心先生的书

徐学舫 徐春辉 撰文/供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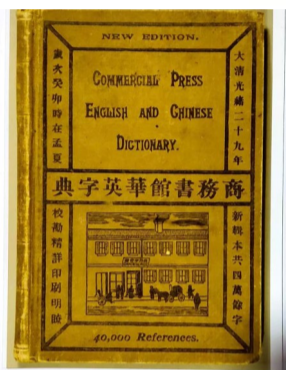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时光里，我与爷爷相依为命。爷爷是“明新学堂”的教师，博学多识，通晓古今。这所学堂由我的老爷爷徐镜心先生于1906年创办，后来爷爷接过教书育人的接力棒，春风化雨，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心怀家国的学子。他们以青春与热血，投身于保卫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们一家八口虽生活清贫，但我却感到无比温暖与快乐——因为有爷爷日日相伴，为我讲述那些动人的故事。他讲过许多历史传奇，而最常提起的，是老爷爷徐镜心在革命岁月中的峥嵘往事。那时我年幼懵懂，许多事尚不能全然理解，但那些故事如种子般，悄然播撒在我幼小的心田。

一天，爷爷从木匣中郑重地取出一本书，轻声说：“今天，咱们就来讲讲这本书。”我起初不解：一本书，有什么好讲的？我缠着爷爷要听更有趣的故事。他却温和地摇头：“这可不是普通的书。你摸摸看，这是你老爷爷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用过的。”我伸手轻触，书壳坚硬，叩之有声。封面上的字迹古朴又陌生，爷爷一字一句地教我念：“商务书馆华英字典。”

这本字典，是1903年徐镜心先生东渡日本求学时随身携带的英语工具书。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（后改宏文学院）修习日语，后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。留学期间，他被推举为“山东同乡会会长”，广结志士。1905年，他在东京与孙中山先生相识相知，志同道合，一见如故。同年7月，他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；8月20日，正式加入“中国同盟会”，成为发起人之一，并被孙中山委任为同盟会北方支部长兼山东主盟人。北方支部统辖八省，革命重任在肩。此后十余载，徐镜心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，坚守民主共和信念，矢志不渝。他倡导新思想、践行新风尚，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、卖国求荣的行径。孙中山先生常以“南宋（教仁）北徐（镜心）”勉励革命同志，时人亦有“南黄（兴）北徐”之誉。

1968年，我十多岁时，一场运动差点将老爷爷的



书籍没收焚毁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，我趁人不备，悄悄将那本承载着家族记忆的华英字典，塞进了院中地瓜井的深处——那一刻，我守护的不仅是一本书，更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。

岁月流转，1985年，我已在乡村中学担任民办英语教师整整十年。因职业缘故，我对老爷爷当年东瀛求学所用的这本字典格外珍视，时常摩挲翻阅，仿佛能触摸到百年前一位青年志士求知报国的赤诚之心。

一天，父亲来电，说烟台市博物馆馆长宋玉娥一行来访，请我回家一叙。见面后方知，宋馆长他们此行一是为梳理徐镜心先生毕生奋斗的革命历程，二是征集相关历史遗物。当得知我仍珍藏着这本字典时，宋馆长欣喜不已，诚恳地劝我将其捐献给国家。我内心矛盾，犹豫良久——这不仅是文物，更是家族血脉与精神的寄托。宋馆长见我爱不释手，轻声说：“要不，我们给些补偿？”我摇头答道：“我不要钱。若为钱财出让此物，我将终生难安，更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爷爷。”馆长与随行人员闻言动容。经再三思量，我终于明白：将它交予国家，让它在博物馆中被更多人看见、铭记，远比藏于私室更有意义。

如今，烟台市博物馆常设“找寻齐鲁记忆”主题展览，吸引八方来客寻根历史、赓续文脉。每次赴烟，我必前往参观。在“辛亥激浪”展区，当我再次见到那本静静陈列的华英字典，心潮澎湃，思绪万千——老爷爷负笈东瀛、投身革命的身影，仿佛穿越百年时光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

那一刻，我不仅重温了一段家族记忆，更经历了一场精神的洗礼。

怀故人

## 母亲

张清林

母亲王彩英于1926年4月14日出生在莱阳市大乔镇大乔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，有两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她排行老么。我大舅是烟台生生堂药店的驻地村。母亲从小聪颖好学，性格泼辣，在读私塾时就表现出出众的才华。她16岁就组织和带领村里的妇女参加抗日救国运动。为了实现从军的梦想，她背着父母随部队南下，走到江苏境内，因大雨与大部队走散，无奈返回了故里，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。跟她一起随部队南下的表姐王秉娥没有掉队，她一直跟随部队到福建厦门，上世纪七十年代转业到地方，成为一名处级干部。

1944年，母亲由我大舅带到烟台，就读于烟台一中，成为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识女性。她思想解放，积极上进，在校期间是优秀学生。毕业后，经我大舅和大伯介绍与我父亲相识，两人结为伉俪。父亲1953年与四个伙计在芝罘区二道兴隆街开办了一家文具社，主要从事花纸印刷、销售及文化用品销售，生意兴隆，1956年公私合营时划入国营烟台印刷厂。父母育有三女两子，母亲相夫教子，过着平淡而富足的市民生活。

那时，毓璜顶街道办事处安排她担任四德街居委会片长，她于是成为一名“小巷总理”。母亲充分发挥知识女性的特长，不计时间，用脚步丈量街巷，把居民的大小事都放在心上，通过和街坊邻里拉家常，帮助困难家庭反映和解决实际问题，赢得了百姓口碑，多次被街道评为优秀片长和先进个人。

母亲抚养五个孩子长大后，于1964年进入兴隆街道工厂，成为一名正式职工。从最初拉风匣烧红炉打铁开始，她先后从事过五金合页插销

装配、半导体晶体管零件装配等工作，直至退休。每次发工资的日子，都成了母亲的感恩日。母亲总是对我们讲，没有党和国家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，就过不上衣食无忧的好生活，教育我们要用辛勤的劳动回馈社会。在工厂期间，她任劳任怨、工作积极，工友们都愿和她交往，班后和节假日，我们家变成了会客厅，工友老汤阿姨、孙淑平阿姨、大吕阿姨、王德玉阿姨和董桂敏阿姨都愿来和母亲叙旧聊天，众人谈笑风生、气氛祥和。我们居住的二道兴隆街5号大院9户人家，是时年周边街巷中出名的“五好大院”。

自从母亲进城成家后，我们家也成了老家乡邻的接待处。不管是父亲的文具社伙计、同事，还是村里叔叔伯伯来我家，母亲都是热情接待，烧水做饭，忙里忙外，从不抱怨，为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赢得了左邻右舍的一片赞誉。

母亲已经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。她教给我们的，从来不是什么大道理，而是待人接物的诚恳，是身处困境的坚韧，是对一蔬一饭的珍惜，是“吃亏是福”的朴拙智慧。这些品质，如细雨渗入泥土，塑造了我们生命的根基。她勤劳、勤奋、节俭，对自己极尽苛责，却把最好的都留给我们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一件衣裳能穿许多年，破了补补再穿，舍不得买新衣裳；有好吃的从不舍不得尝一口，全都塞进孩子手里和我父亲口中。她总说自己不饿、不冷、不需要，却把儿女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，我们每每在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进步，获得了荣誉，她都念叨许久，眉眼间满是骄傲和高兴。

我的三个姐姐历年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，弟弟是职业学院的教师。我们姐弟5人遵照母亲的嘱托，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## 绿宝石汗衫

张凯顺

多年前，我在烟台八中读书时，很喜欢穿一件短袖汗衫。这汗衫不是什么大牌，却是当年烟台人眼里实打实的名牌：绿宝石。

1958年1月，多家袜厂公私合营，成立烟台针织厂。1980年，正式更名为烟台针织总厂，厂址位于芝罘区西大街88号，就在汽车总站对面，是老烟台人记忆里的一处坐标。

后来，烟台针织总厂与烟台经编厂合并，组建为烟台针织联合公司，搬到原经编厂地址——凤凰台路82号。一度，这里机声隆隆，是烟台纺织工业一块举足轻重的招牌，数不清的职工在这里上班，把青春织进一匹匹布料、一件件成衣里。

时代浪潮翻涌，1997年，企业改制，更名为烟台绿宝石服装有限责任公司。“绿宝石”这个名字，寄托着所有职工的期盼——像宝石一样，光亮、长久、价值不菲。

那时的“绿宝石”风光一时，是不少烟台人衣柜里拿得出手的本地品牌。穿着它出门，是体面，是骄傲，是属于这座城市的时尚印记。

1998年，绿宝石推出夏季新款。男生的流行套装是一条白色短裤，配一件蓝色或白色短袖汗衫；女生则是一条白色短裤，配一件红色或白色短袖汗衫。

我的那件汗衫，是在阳光下有些耀眼的绿，可惜被一个鲁莽的同学在推搡中撕破了。同学赔了我十五元钱。那几张皱巴巴的纸币，被他有些难堪地塞进我手心。我接下时，心里却像衣服裂口一样，空荡荡地漏着风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穿上绿宝石。

后来，我用那笔“赔偿金”，加上自己从早饭钱里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积蓄，又去买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绿宝石汗衫。我执拗地认为，只有重新穿上那抹完整的绿，才算是赢回了点什么。

2004年，绿宝石公司宣告破产。

机器停转，厂房沉寂，曾经熟悉的品牌渐渐淡出视线，只留下老照片、旧衣物和一代烟台人的回忆。

许多年后，当我翻出那件领口已微微松弛的绿宝石短袖衫，我才真正明白，绿宝石的兴衰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命运变迁，它更是中国纺织业走向市场经济阵痛的缩影。

绿宝石是一代烟台人的共同记忆，它用绚烂的崛起与苍凉的谢幕，证明了一个简单又残酷的道理：在滚滚向前的时代浪潮里，任何明珠的璀璨，都并非永恒。若不能随时代打磨自身，不能适应市场而勇敢蜕变，再辉煌的过往，也终将被后浪无情吞没。